

结算与波动：近代长江流域金融 市场中的申票流通

方前移¹

(安徽工程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随着近代口岸条约体系的建立，长江流域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圈，刺激了通商口岸埠际贸易的繁荣。由于近代中国币制长期不统一，贸易繁荣需要发达的金融内汇市场为其服务。在长江区域内汇市场的诸多金融工具之中，申票因为具备强大、便捷的汇兑、结算功能，极大地解决了埠际贸易对于资金的流动需求，从 19 世纪末始，成为最重要的内汇金融工具。但是，申票归根到底是一种信用票据，由于钱庄作为发行主体，存在着诸多不足，导致长江流域各埠申票市场中投机盛行，金融波动不已。20 世纪 30 年代，在众多内外因素的叠加影响之下，申票劣势更加明显，银行票据明显表现出对申票的替代趋势。

【关键词】 结算 波动 长江流域 申票 钱庄

一、前言

1850 年代，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国内贸易最为繁荣的城市。同时，自 1842 年沿海五口通商之后，西方列强一直进行着强制长江流域开放的侵略计划，至 1904 年长沙口岸最终被迫开放，长江流域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均有口岸对外通商。长江流域成为中国近代贸易开放程度最高的内河区域，其贸易地位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长江流域约开通商口岸占全国约开通商口岸贸易总额百分比(%) (1900—1933)¹

年份	上海	长江流域口岸	年份	上海	长江流域口岸	年份	上海	长江流域口岸
1900	17.28	47.84	1912	15.71	45.82	1924	26.59	51.27
1901	17.70	45.46	1913	15.83	44.50	1925	25.34	50.53
1902	17.57	45.13	1914	17.08	47.89	1926	29.01	51.82
1903	14.02	45.92	1915	16.23	47.85	1927	27.85	46.08
1904	16.47	48.16	1916	17.03	48.03	1928	28.58	50.36
1905	17.89	47.35	1917	18.60	47.92	1929	28.67	49.97
1906	17.90	46.78	1918	20.45	43.59	1930	31.74	50.20

¹作者简介：方前移，男，博士，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长江流域对外贸易中的竞合关系及效应研究(1895—1937)”(项目编号：19BZS141)

1907	14.46	46.63	1919	20.93	47.89	1931	34.18	50.09
------	-------	-------	------	-------	-------	------	-------	-------

(续表 1)

年份	上海	长江流域口岸	年份	上海	长江流域口岸	年份	上海	长江流域口岸
1908	13.82	46.70	1920	24.98	49.44	1932	38.30	53.76
1909	14.52	45.19	1921	23.98	46.18	1933	44.01	60.65
1910	14.91	44.74	1922	24.80	47.42	平均	22.05	48.11
1911	17.39	45.12	1923	25.95	49.61			

可见，长江流域约占近代中国各约开通商口岸海关贸易统计总值的一半左右，而上海又占据长江流域各海关贸易总额的近 20%至 50%。长江流域各省内地的市场，一面向这些通商口岸输出土货，一面由通商口岸购进洋货，构成了普遍的贸易物流。但是除上海之外，其他口岸与国外之间直接进出口贸易仍然十分有限，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对国外直接贸易占其输出贸易额百分比 (%) (1930)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重庆	1.99	汉口	14.31	苏州	1.72
宜昌	1.52	九江	5.22	抚州	18.18
沙市	0.4	芜湖	8.14	宁波	27.93
长沙	2.96	南京	36.80	温州	13.13
岳州	0.57	镇江	29.87		

这些口岸不仅国外贸易主要依靠上海转运，而且在国内贸易中，也与上海联系紧密，从而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市场圈。

这种埠际贸易需要金融为之服务。在 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之前，近代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度，银两、银元种类很多，平砵不同，成色互异。在有直接汇兑市场的两埠之间，银两汇兑市价的涨落，需要根据两埠银两互换平价，运输耗费轻重，以及市面供需缓急而定。至于两埠银元汇兑，更是根据两埠银两之间的“洋汇”、银两与银元之间洋厘的高低以及其他因素综合计算⁽¹⁾。例如，自光绪年间，汉口申汇市场一直由钱业公会主持，交易时间为每日上午 10 点开始，11 时收盘。洋汇系以汉口“洋例银”与上海“规元银”兑换率为依据计算，然后再须以两地的洋厘进行折算。假如某日上海洋厘为 0.719 规元两，汉口洋厘为 0.7036 洋例两，申汇银两汇价为 972 洋例两，如果需从汉口汇入上海 1000 元，实际上汉口钱庄只需交付 993.27 元就可完事。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1 元沪洋=0.719 规元两，1000 规元两=972 洋例两，0.7036 洋例两=1 元汉洋，最后计算 $0.719 \times 972 \times 1 \times 1000 \div (1 \times 1000 \times 0.7036) = 993.27$ 元⁽²⁾。

这种贸易结算计值的反复换算，刺激了中国内汇市场犹如外汇市场一样高度发达。19 世纪末，特别是在长江流域，随着山西票号的衰落，以及中国现代银行尚未兴起，钱庄逐渐成为内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即使 20 世纪以后，现代银行兴起，但钱业与银行相比，仍然有着诸多的优势。有学者就指出：钱业与商人往来密切，素知商人信用，可以放胆经营；钱业能互相联合，使得极小商埠也有钱业与外埠联系；钱业规矩不严，能主动迎合商人，“汇水”也小⁽³⁾，从而长期控制着中国内汇市场。

在埠际贸易之中，各埠与上海之间的贸易往来最为紧密，决定着各地与上海之间的内汇市场最为重要。各地与上海之间的金融汇兑可以统称为“申汇”，而“申票”是其表现形式。学界认为，申票是以上海钱庄或商号为付款方，以上海规元为计算单位的汇票总称，其中又以钱庄汇票为主。目前学界对于申汇的汇兑、结算功能，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论文⁽⁴⁾，但是这些论文或者着眼于全国市场，或者着眼于个别商埠的研究，论述陷入抽象或零碎，而且对于申汇的投机、助长金融波动的现象着墨不多。近代上海是全国金融中心，与长江流域的商埠金融联系十分紧密，长江流域也是近代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长江流域市场，对申票在金融市场上的正反作用，进行综合研究。

二、申票加快贸易流通

在近代中国，由于银两、银元作为实体货币，运输麻烦，充满风险，平时贸易金额大时往往依赖票据计算。因申票信用最高、流通最广，外地钱庄在资金多余时常购入申票，紧缺时售出申票。商人持有申票等于掌握现金。各通商口岸一般都有申汇市场，从事申票买卖，没有直接汇兑关系的商埠之间，也可以通过申票转汇，完成两地交易。申票在全国内汇市场起着主导作用，埠际贸易资金清算多依靠申票，各地汇兑市场也多以申票行情为依据⁽⁵⁾。因此，当时上海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有人把它比之为世界的伦敦、纽约⁽⁶⁾。长江流域的汇兑市场实际上受上海市场直接或间接控制。如长江中游汉口为南北通衢，但贸易、金融仍受上海调节，其汇兑市价与沪市最为密切⁽⁷⁾。湖北沙市汇兑业务以与汉口数量最多，与上海之间的申票交易可在汉口转汇，1927 年后，沙市申汇更是转由上海直接收解⁽⁸⁾。宜昌钱庄多为沙市、汉口钱庄分庄，宜昌汇兑生意，以渝、沙、沪、汉为多，汇渝、汇沪，可由沙、汉转汇⁽⁹⁾。长沙为湖南省会，由于地处洞庭湖以南，贸易地位受限，据 1920 年代上海银行调查，长沙与上海之间的汇兑，须以汉口为转汇⁽¹⁰⁾。至于湖南省内地现金流动及金融行市，则多受汉口金融市场指挥，间接亦受上海市场的影响⁽¹¹⁾。九江与沪、汉有直接汇兑行市，与其他埠际汇兑皆需通过汉票和申票转汇⁽¹²⁾。南昌为江西省经济中心，与上海、汉口之间有直接汇兑行市，而与其他各埠均以申、汉行市价为换算标准⁽¹³⁾。

长江下游通商口岸与上海联系更为紧密。如芜湖汇兑以汇往上海为最多，“进出口货，皆以申票为枢纽……其余货币涨落，亦以申票价为转移。若与京、津等埠银两汇兑，皆须按两方申票市价划合”⁽¹⁴⁾。南京汇出款项频率以汇往上海最多，汉口、南昌次之；汇入款项金额也以上海为最多，约占 9/10，其他各处汇入款项则为数甚小⁽¹⁵⁾。镇江除与上海、汉口有直接汇兑行市之外，与其他埠际汇兑多以上海为中转。如镇江与广东之间贸易互补性强，贸易额庞大，款项汇往广东，往往需要以镇规元行市和申毫洋行市结合折算⁽¹⁶⁾。杭州直接汇兑以上海为最多⁽¹⁷⁾。宁波金融向以沪市为转移⁽¹⁸⁾。苏州直接汇兑以上海为最多⁽¹⁹⁾。扬州为淮南盐业仓储集中地，全年汇进、出款项，均以上海为最多。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淮南盐业仍然实行纲商引岸制度，淮南引盐的销售市场垄断湘鄂赣皖四省 200 余县，盐商在各地引岸市场售出淮盐，买进申票，再用申票前往扬州重新购买盐引，申票再在上海兑现。扬州东面的南通市面洋厘，也以申票为标准，以镇江市为转移，各钱庄交易，均以申票为常例⁽²⁰⁾。

19 世纪末期，埠际申票流通，除了商人随身携带之外，主要依靠民信局运输。随着贸易繁荣，宁波人创办的民信局因时而兴。晚清文人记载，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后，“信局之业乃大盛。其主其伙大都皆宁波人，东西南北，无不设立。水路以舟，陆路以车，以急足。南北交通最早，故设局尤夥。大而都会，小而镇市，皆有其足迹焉。书函之外，银物亦可寄递，遗失者偿之。”⁽²¹⁾宁波人将民信局总行大多设在上海，在他埠设立分局，申票可由其寄送，从而形成全国性的邮件网络。如据 19 世纪末各埠海关资料记载，上海民信局对附有汇票的挂号信，比普通信件收费高些，汇票全部具有抬头，风险不大，如耽误时辰造成汇率波动损失，由民信局赔偿⁽²²⁾。九江有 14 家民信局，可以通过中外轮船与其他口岸联系，也可以通过其他寄送方法与他省内陆联系。附有汇票信件的邮费，至上海每千两 700 文，至汉口、芜湖、镇江则是 400 至 600 文不等⁽²³⁾。岳州有 4 家民信局，都是长沙民信局的分支，除了寄送信件和包裹之外，也从事汇票和金银的寄送业务，从湖南长沙、湘潭、常德等商业重镇至湖北、

四川、江苏、上海等，每千两汇票收费 0.80 到 1.60 两不等，而运送每千两白银收费则自 15 到 30 两不等⁽²⁴⁾。重庆民信局主要利润来源于寄送各种汇票，汇款数量常年在 300 万两左右。除了信差白天服务之外，重庆也有不分昼夜的快信服务项目，快信路线里程总计长达 7500 公里以上，每天都有重庆与汉口、上海、北京往来的邮件或汇票，时间在当时已经缩短到无可再减的限度⁽²⁵⁾。

民信局这种多样化的服务，显然加快了申票的流通。随着 1897 年大清邮政局的设立，邮政事业成为政府需要担负起来的职能，全国官方邮政网络得以逐步形成。随着现代电报业的发展，申票递送方式变得更加快捷、多样，可以通过电汇、票汇、信汇等多种方式进行转汇。

申票在长江流域快速广泛地流通，有利于推动贸易业的发展。因为申票流通，可以减少运输现银带来的风险。例如，川省输出输入的大宗商品，凡需调动银根，莫不靠申票为之转输挹注⁽²⁶⁾。四川涪陵盛产榨菜，商人运往上海销售之后，并不一定购买他货返回，而是往往根据行情，选择购买近期或远期申票，携带返回涪陵，再做其他生意生利⁽²⁷⁾。申票在南昌金融市场也占据重要位置，因为南昌向上海采办货物，均以申票结账，造成申票涨落除受上海市影响之外，还需看南昌市场上申票数量的供需多寡⁽²⁸⁾，而南昌对上海的输出贸易少，输入贸易多，基本处于入超地位，因而南昌又需要从本省其他商业城镇大量购买申票用于周转。例如景德镇的瓷茶、河口镇的纸张、赣州的竹木都是江西省大宗名产，各地客商前来购买，均系携带申票，再向素有往来的本地钱庄支用款项，而景德镇等地从上海输入商品较少，造成申票在景德镇等地没有大的市场，大多由各钱庄转售于省城钱庄、银行⁽²⁹⁾。在安徽屯溪，平时市面银两稀少，商家进出款项，均将以规元银为单位的申票折合成本地流通的银元计算，平时票价也与沪、杭市价相仿，只是一至茶季，因有大量银元自沪、杭运入，申票才较沪、杭市价为低⁽³⁰⁾。安徽芜湖是中国著名米市，米粮贸易量庞大，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各帮坐庄米号，以申票向芜湖钱庄兑现，购买米粮，钱庄再将申票卖于商号从上海购货，或者委托上海银钱同业在沪兑现或冲账，而与他埠之间则可通过申汇转汇加强贸易联系。如广州为安徽稻米最重要的消费市场，需要通过上海中转。广州米商先在上海觅妥一家商号，再委托芜湖广帮米号向芜湖钱庄借款购米，然后委托上海代理商号将借款付还给芜湖钱庄在上海的联号或有代理关系的钱庄，最后广州米商只须申汇货款归还上海代理商号，就可完成三地米粮贸易⁽³¹⁾。江苏镇江盛产绸缎，买卖以春、秋两季为盛，但成交之地多在上海或苏州，卖主将所得的申票或苏纹银陆续运回镇江，兑换本地银两，每年数量有 300 万元之巨⁽³²⁾。四川、贵州盛产的桐油，也大都以镇江为聚集地，再分销长江南北，以四、五、六月最盛，每年产额达 300 万两，因而在五、六月会有大量申票汇入镇江⁽³³⁾。常州以木材和黄豆交易最盛，木材主要来自江西，全年交易达二百数十万两，又半数来自赣州，因而赣州商人在常州设立坐庄代客汇款，从前均以盐库平银汇往江西。民国以后，则改为申票，径自汇往上海，由驻沪的江西坐庄接受⁽³⁴⁾。上海为长江流域的物资集散地，土产贸易以春茧、秋棉为两大宗，蚕丝主要产自浙江嘉兴、湖州，江苏常州、无锡，安徽青阳等地，商人每年大约四月半由沪出发，携带申票，分赴各处采办⁽³⁵⁾。上海作为中国棉纺织业最为发达的城市，是典型的用花码头。汉口为湖南、湖北棉花的输出码头。上海(棉)花号往汉口办货，向上海钱庄开出申票，向汉口钱庄兑现收花，汉口钱庄则将申票加价卖与需向上海办货的商号⁽³⁶⁾。

申票流通一旦受阻，就会产生连带影响。例如在江西内地，每当茶叶上市季节，茶号需要现款购茶，由于资本弱小，向来依靠上海茶栈以申票放款为来源，然后茶号再在本地出卖申票，获得现金，收购茶叶。1927 年因为上海时局关系，茶栈没有放出申票，加上景德镇、乐平等处也难以筹集现洋，致使银根紧迫，茶叶贸易萎缩⁽³⁷⁾。又如 1936 年上海洋庄茶叶公会因反对皖省统制祁门红茶运输，停止兑现申票，江西景德镇和安徽至德县商人资金周转不便，市面恐慌，两地商会都电呈上海商会，要求“接济”⁽³⁸⁾。

申票的流通，大大减少埠际现金的运输，很多商埠设有钱业公会，实施申票汇划制度，相互“过账”，进一步方便商品贸易。例如，宁波与上海一衣带水，宁波钱庄与其他城市钱庄相比，总是尽可能地将流动资金运往上海投资生利，因此宁波市面常常缺乏备用资金。大多数情况下，宁波市面生意是双方在钱庄结算，凭一种特别簿记，登载各自出入款项，相互“过账”，很少需要现金交易。每年只是当茶叶和蚕丝上市时，才需要较多现金用于流通⁽³⁹⁾。杭州银钱业同行往来，收付统归汇划转账，因而杭州金融不啻于以划洋为本位，现金反成辅助。例如，每至现洋用处清淡之时，如五、六月，这时现洋用途不广，无利可图，但划洋则仍有一分五厘日拆收入⁽⁴⁰⁾。重庆也于民国前期创立了钱庄划拨制度，不用支取现金⁽⁴¹⁾。汉口市面习惯每月逢月半、月终

为比期拆息行市，而每至比期，汉口钱业之间的票据划账数目，动辄以上千万元计算⁽⁴²⁾。

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早在 1890 年就设立钱业汇划总会，以公单计数，对票据进行清算，汇划总会显然是票据交易所的雏形⁽⁴³⁾。20 世纪 30 年代，全国农村经济恐慌，内地白银汇集上海成为普遍趋势，如 1933 年底，上海库存白银计值已由 1930 年的 2 亿 6000 万增至 5 亿 4700 余万元，更是较 1921 年增加 8 倍⁽⁴⁴⁾。1933 年上海银行业票据交换也高达 2 亿 3000 万元。钱业公单收解在最繁忙的月份达 20 亿元，全年平均计算，每月也在 18 亿元左右⁽⁴⁵⁾。又如 1935 年上海的银行全年票据交换总额为 37 亿元，而钱业公单的收解仍远在银行票据交换之上，全年达 207 亿 8000 万元⁽⁴⁶⁾。显然钱业票据远远超过白银实体货币及银行票据的数额，足见钱业在金融市场上的雄厚实力。

以申票为主的汇票在长江各埠贸易中的作用，我们还可以根据海关资料统计作进一步量化分析，如下表 3、表 4 所示。

通过对表 3、表 4 各口岸海关统计数据的计算，就海关进出的金银价值与贸易价值占比而言，重庆为 4.79%，宜昌为 9.79%，沙市为 9.54%，长沙为 1.46%，岳州为 4.19%，汉口为 7.60%，九江为 8.09%，芜湖为 12.40%，南京为 16.86%，镇江为 14.22%，上海为 11.38%，苏州为 25.68%，杭州为 12.05%，宁波为 3.88%。在各埠海关进出的金银之中，由于黄金在中国不是流通货币，各海关输出输入的黄金主要是作为奢侈品消费，比例非常有限，可以忽略不计，因而以白银为输出主体。但是白银（银两、银元）价额与贸易价额相比，所占比例仍然极小。显然，各埠之间贸易主要通过申票为主的汇票融资、结账。如据 1882—1891 年芜湖海关十年报告记录，芜湖海关白银进出总值约占芜湖海关贸易总值的 1/6，其余 5/6 的贸易流通，依靠金融票据的服务。1891 年芜湖 12 家钱庄收支总量达 5000 万两之多，其中汇票占 8/10，而在汇票之中，又有 8/10 是在长江埠际流通，其中以申票为主体，至于白银的流通则多是起着辅助作用⁽⁴⁷⁾。20 世纪 30 年代情况依然如故。笔者依据《金融周报》的数据统计，1936 年 7 月、1937 年 1 月和 5 月，芜湖汇出汇入的申汇数量分别为 224.8 万元，471.5 万元，403.6 万元⁽⁴⁸⁾，远超白银的流量。

表 3 长江流域口岸海关贸易额平均值(1900—1933 年)(海关两)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重庆	44044303	汉口	229854643	上海	1091242535
宜昌	28984454	九江	41027542	苏州	11836751
沙市	10587318	芜湖	31695022	杭州	20437142
长沙	24035908	南京	23583741	宁波	32437869
岳州	10578420	镇江	26973438		

表 4 长江流域口岸海关进出金银额平均值(1900—1933 年)(海关两)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通商口岸	百分比
重庆	2111317	汉口	17464717	上海	124139031
宜昌	2837012	九江	3318340	苏州	3039598
沙市	1010225	芜湖	3926920	杭州	2462862

长沙	3515224	南京	3977230	宁波	1260083
岳州	442827	镇江	3835573		

三、申票助长金融波动

钱庄汇票作用巨大，但钱庄皆无巨本，主要依赖客户存款及银行拆票，存在巨大的风险。1880 年代以来，外国银行加强在中国的投资，其主要业务在于向中国钱庄放款生利，因而钱庄向银行拆票容易，导致上海汇划钱庄开设太多⁽⁴⁹⁾。钱庄重视信用放款，虽然在金融稳定时，有利于贸易的发展，但是滥贷款项，极易扰乱市场。例如浙江金华、兰溪、义乌一带，生疏之人，只需以票额 20% 的现金，就可向钱庄预立汇票，然后受授于市，是以执票人极易蒙受重大损失。在承兑方面，对于此项空头汇票，也稍有不慎，立成废纸⁽⁵⁰⁾。此外近代各埠钱业汇票印刷多用普通纸张，汇票图章也极简略⁽⁵¹⁾，不如银行票据复杂，导致钱业汇票造假现象盛行，因为举手之劳或可立致巨富，败也刑不至死⁽⁵²⁾，从而加剧金融波动。有外国学者也敏锐指出，钱庄因无限制贷放而难以收回债款，因无限制发行票据而终致受到挤兑威胁，构成钱庄的致命伤⁽⁵³⁾。以上海为例，自清季以来历经金融恐慌，钱庄陷入漩涡。究其原因，虽有多端，但滥发庄票、汇票是主要原因，因为钱庄储存资金不多，一旦周转不灵，兑款无门，就会扰乱金融市场⁽⁵⁴⁾。

如 1883 年初，上海钱业大量投资的金嘉记源号丝栈倒闭，造成贷款无法收回，银根紧缩。1883 年 11 月 2 日，因为投资丝业失败，胡雪岩的上海阜康钱庄破产，形成钱业挤兑风潮，到该年年底，上海钱庄倒闭数量在一半左右。1897 年因为广东帮的协和钱庄不顾风险，开创贴票业务，开始获取暴利，其他钱庄纷纷效仿，从事贴票投机，最终引发金融风潮，导致很多汇划钱庄停闭⁽⁵⁵⁾。1910 年因为橡皮股票投机风潮，钱庄庄票、汇票无法兑现，成为相关诉讼案的主因，钱庄亦纷纷倒闭，再次形成金融风潮⁽⁵⁶⁾。

上海的每次金融风潮，由于长江埠际钱庄存在总分号的设立关系，或者相互代理关系，以及相互投资入股等，产生紧密联系，且往往以申票为载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 1883 年，上海阜康钱庄在杭州、宁波、汉口联号倒闭。在 1910 年的金融风潮中，浙籍商人创办的源丰润钱庄破产，而其设于各省城及商埠的 17 处分号也纷纷破产⁽⁵⁷⁾。受源丰润钱庄破产的影响，合肥李氏（李鸿章家族）和苏州东山席家（席正甫家族）合开的义善源钱庄，在全国的 14 处支店，也于 1911 年倒闭⁽⁵⁸⁾，造成金融震动。如在南通，义善源钱庄倒闭，使得农工商部储存于该庄的官款以及地方商业各款毫无着落，南通商会电请农工商部维持金融市面⁽⁵⁹⁾。上海金融风潮又导致扬州和大钱庄倒闭，后继倒闭的钱庄众多，市面震动，谈者色变⁽⁶⁰⁾。上海源丰润、义善源及扬州和大钱庄倒闭，又导致镇江宏仁钱庄破产，亏空客户 22 万两之多，其他钱庄也受其害⁽⁶¹⁾。上海义善源钱庄、镇江宏仁钱庄倒闭，又导致李鸿章家族在芜湖的宝善长钱庄受累，芜湖金融界发生大恐慌⁽⁶²⁾，汉口钱业也大都停歇⁽⁶³⁾。汉口钱业倒闭，又造成赣省钱业风声鹤唳⁽⁶⁴⁾。

除了以上金融风潮之外，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不稳定，战事不断，国内外因素往往都会引起上海钱业波动，进而以申票为载体影响长江各埠。例如，1914 年欧战爆发，汉、沪商埠银根奇紧，银价增涨，波及江西⁽⁶⁵⁾。景德镇钱商多凭申票周转，因为欧战爆发，上海汇兑不通，景德镇钱庄纷纷倒闭，造成祁门、浮梁茶商带回申票均无现款可兑，市场惊慌⁽⁶⁶⁾。景德镇的瓷商向以有期申票，先付钱庄，钱庄出给有期支条，交付瓷商，购买瓷器。1924 年江浙发生战事，上海汇兑不通，申票难以兑现，景德镇瓷业前途堪忧⁽⁶⁷⁾。因为江浙战事，南昌、九江与上海的汇兑率上升，南昌、九江发生挤兑风潮⁽⁶⁸⁾。1925 年，在上年江浙战争和该年五卅运动影响下，汉口钱业公会已成惊弓之鸟，特向同业发出要求，嗣后凡经售申票之家，应限在六天以前交票，不得迟延⁽⁶⁹⁾，以便缩短兑票期限，应对危机冲击。1925 年五卅运动，上海钱业停市，不出申票，造成芜湖金融吃紧，钱业为搜罗现洋，抬高洋厘，金融发生恐慌⁽⁷⁰⁾。1927 年之前，景德镇钱庄有大小 70 余家，随时可以兑现，买卖便利。1927 年后，仍因战事不断，金融吃紧，申票呼应不灵，钱庄支条也搁浅不能流通，钱庄多审慎放款⁽⁷¹⁾。

20 世纪 30 年代，在自然灾害、国际经济危机、白银危机、战争威胁等因素叠加影响之下，上海与长江各埠更是形成 1935 年的钱业大恐慌。例如，汉口钱庄以经营申汇为主要业务，从其业务中不仅得到上海钱庄的放款支持，而且可以直接出卖申票吸收现款，作为流通资金。1935 年春，上海发生钱业恐慌，停止放款，引起汉口钱业市场萎缩⁽⁷²⁾。6 月 23 日，宁波帮的汉口钱庄大王源裕钱庄倒闭，引发一半钱庄歇业⁽⁷³⁾。汉口外国洋行在川省重庆、万县等处设庄采办桐油，历史悠久，依赖汉口钱业融资，1935 年申汇暴涨，造成川省金融恐慌，桐油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⁷⁴⁾。上海的金融恐慌和汉口的源裕钱庄倒闭，引发宁波挤兑风潮，宁波钱业中汇划钱庄原有 37 家，倒闭 1/3⁽⁷⁵⁾。而宁波钱业风潮又引发余姚钱业风潮⁽⁷⁶⁾。显然，1935 年的金融风潮，不仅限于通商大埠，其他各县以至乡僻小镇，无不受其影响，特重于钱业⁽⁷⁷⁾。例如，上海南北市的所有汇划庄，1928 年有 87 家之多，到 1935 年春减少至 57 家；其他各埠更甚，汉口钱庄在 1935 年减少 3/5，南京由六七十家减为 12 家，苏州由 50 余家减至 10 余家，镇江由 30 余家减至 5 家⁽⁷⁸⁾。

申票为信用票据，其汇兑涉及洋厘、银汇的计算，受到各埠汇票的供需情况、公私款项的解送情况、银根松紧等诸多因素影响，因而又会刺激各地金融市场申票投机盛行。各埠钱商乐做申票汇兑，买卖空盘，从中操纵，致使市面金融随时发生剧烈变动⁽⁷⁹⁾。例如，重庆省际汇兑，向以上海为中心，平时“汇水”涨落，恒以贸易比差及银根活滞情况为转移。但汇兑交易，常有投机者从中操纵，图获渔利，所以“汇水”涨跌极巨⁽⁸⁰⁾，为近代长江流域申票投机的典型口岸。自民国以来，四川军阀混战，商业波动，贸易涨落不定，造成申汇有利可图，银钱业多从事申汇投机买卖。例如，1915 年成立的重庆聚兴诚银行，利用各码头申汇汇率差异，一直从事翻码头的“套汇”活动，在 1928—1932 年间，其汇费收益在全国重要公私银行中，仅次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名列第四。申汇的涨落，造成重庆“申票大王”石建屏的暴富和破产的跌宕传奇人生。在 1932 年重庆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重庆申汇市场设在钱业公会之内，每日上午 11 至 12 时，各会员钱庄派人齐集公会，商谈借贷及汇兑事宜，尤其关注申票、汉票的买卖⁽⁸¹⁾。1932 年 4 月 20 日重庆证券交易所成立，迅速成为重庆最大赌盘申汇的赌家⁽⁸²⁾，名以经营国家和地方债券为主要业务，实际以经营申票为主业，规定只有加入交易所的钱庄和银行才可以从事该项业务，实行垄断⁽⁸³⁾。重庆下游的万县也盛行赌申汇，1933 年造成钱庄倒闭 20 余家，形成万县钱庄业总崩溃的现象⁽⁸⁴⁾。

四、结语

近代中国通商开放之后，客观上刺激了国内外贸易发展。长江流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内河区域，上海成为贸易最为繁荣的城市，上海这种贸易地位需要金融为其服务。由于近代中国货币长期尚未统一，上海钱庄因为诸多优势，其发行的申票成为内汇市场中的主要信用凭证。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现代银行业的发展，钱庄相对于银行而言其缺点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信用注册资本不及银行，不利于政府监管，金融风险大等。在危机中，这些缺点会成为漏洞，影响钱庄汇票的兑换能力。纵观近代长江流域各埠金融市场的变迁史，钱庄数量不断变化，钱庄开业不断、又破产不断，单个钱庄长期生存艰难，其发行的汇票在流通中存在着严重风险系数。

南京国民政府于 1933、1935 年先后实施废两改元、法币改革的货币政策，更使钱庄失去了埠际汇兑、洋厘等业务，钱庄申票使用价值进一步减小，很多口岸钱庄破产，钱庄数量急剧下降导致钱业公会对市场的控制力也逐渐被银行所取代。例如，昔日芜湖钱业为徽省各业首脑，操金融枢纽，盛极一时，迫实行废两改元，所谓执金融之牛耳的钱业，完全让渡于银行⁽⁸⁵⁾。重庆、汉口、上海分别作为长江上、中、下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金融中心，钱业公会虽然仍然存在，但势力与影响力下降明显。在上海，1933 年票据交换所成立之前，银钱业票据清算，权力掌握在汇划钱庄组成的汇划总会手中。1933 年 1 月票据交换所成立之后，虽然银行与钱庄之间的收解仍然被总会掌握，但是银行之间的票据已经脱离了汇划总会的控制。1935 年钱业风潮之后，上海开始实施银钱业汇划票据分离办法，汇划总会仅仅办理钱庄之间票据的收解，虽然钱业公单数额仍然超过银行业，但业务范围缩小。

为了减少申票信用放款的风险，20 世纪 30 年代长江各埠开始积极推行商业承兑汇票的流通。商业承兑汇票是以商品货物为抵押，能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贴现的一种汇票，其较以信用为主的钱庄汇票流通安全，进一步体现出银行及其票据在内汇市场上代替钱庄及其汇票作用的趋势。

注释:

1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第三表),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168 页。

2 吴宗焄、童蒙正:《中国之汇兑》,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98—99 页。

3 洪葭管:《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8—119 页。

4 典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大东书局 1930 年印,第 130—131 页。

5 石涛:《汇兑、结算与投机——近代申汇问题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8 年第 3 期;马建华:《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汇兑层级体系——从申汇计算公式看近代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圈的构建》,《上海经济研究》2013 年第 3 期;蔡三锐:《近代申汇研究》,东华大学 2013 年度博士论文;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等。

6 杜恂诚、贺水金、李桂华:《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7 页。

7 典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大东书局 1930 年印,第 138 页。

8 李炳堂:《汉沪汇兑述要》,《银行杂志》第 1 卷第 2 号,1923 年 2 月。

9 谢也青:《沙市金融状况之过去及现在》,《汉口商业月刊》第 1 卷第 7 期,1934 年 7 月。

10 双一:《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湖北省》,《钱业月报》第 2 卷第 3 期,1922 年 3 月。

11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25 年印,第 419—424 页。

12 刘世超编:《湖南之海关贸易》(二),湖南经济调查所 1934 年印,第 31 页。

13 《九江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算法》,《银行周报》第 3 卷第 10 期,1919 年 4 月。

14 《南昌之通用货币及其汇兑算法》,《银行周报》第 2 卷第 20 期,1918 年 5 月。

15 《芜湖金融调查》,《中央银行月报》第 3 卷第 11 期,1934 年 11 月。

16 《各地金融市况》,《中央银行月报》第 1 卷第 1 期,1932 年 8 月。

17 双一:《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江苏省》,《钱业月报》第 2 卷第 8 期,1922 年 9 月。

18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 1933 年印,第 24—25 页。

19 《记杭绍甬之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 2 卷第 22 期,1918 年 6 月。

20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25 年印,第 87—90 页。

-
- 21 双一：《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江苏省》，《钱业月报》第2卷第8期，1922年9月。
- 22 徐珂：《清稗类钞》第5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0页。
- 23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
-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2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6页。
-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3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289页。
- 26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8—70、154页。
- 27 虞澜康：《从申汇说到现金问题》，《四川经济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4月。
- 28 四川省涪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4页。
- 29 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编：《江西之金融》，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1933年印，第134页。
- 30 双一：《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江西省》，《钱业月报》第3卷第2期，1923年3月。
- 31 双一：《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安徽省》，《钱业月报》第3卷第3期，1923年4月。
- 32 顾翊群：《广州之米业》，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38年印，第35页。
- 3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5年印，第36页。
- 34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5年印，第37页。
- 35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5年印，第46—47页。
- 36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5年印，第1—2页。
- 37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9—180页。
- 38 《婺源》，《申报》1927年5月22日。
- 39 《皖赣各商会电沪商会请令茶栈照兑汇票牵动皖赣两省金融关系重大数十万茶农茶工茶商受影响》，《申报》1936年4月26日。
- 40 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

86 页。

41 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8—119 页。

42 《重庆划条制度演变之始末》，《四川月报》第 8 卷第 1 期，1936 年 2 月。

4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编：《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925 年印，第 370 页。

4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3 页。

45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二十二年度上海金融市场变动之回顾》（上），《中行月刊》第 8 卷第 5 期，1934 年 10 月。

46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二十二年度上海金融市场变动之回顾》（中），《中行月刊》第 8 卷第 6 期，1934 年 12 月。

47 余定义：《二十四年度上海金融市场之演变》，《中行月刊》第 12 卷第 6 期，1936 年 12 月。

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 152 册，京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9 页。

49 方前移：《国家视域下皖江区域经济 187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80—281 页。

50 《论钱市之衰》，《字林西报》1884 年 2 月 8 日。

51 葛成章：《汇票之责任问题》，《钱业月报》第 14 卷第 2 号，1934 年 2 月。

52 景：《伪造汇票的局骗》，《交行通信》第 2 卷第 6 期，1933 年 3 月。

53 周仲陶：《钱庄庄票应改良以防作伪之商榷》，《钱业月报》第 4 卷第 5 期，1924 年 6 月。

54[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代译者序第 14 页。

55 《庄票之研究》（三），《工商新闻》1926 年 7 月 10 日，第 4 版。

5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6—57 页。

57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4 页。

5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80 页。

59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88 页。

-
- 60 《通州义善源影响再记》，《时报》1911 年 4 月 15 日。
- 61 《扬州金融恐慌之维持法》，《时报》1911 年 4 月 15 日。
- 62 《镇江宏仁倒闭讯》，《时报》1911 年 4 月 15 日。
- 63 《芜湖金融界大恐慌》，《时报》1911 年 4 月 17 日。
- 64 《汉口钱业恐慌详情》，《时报》1910 年 11 月 22 日。
- 65 《赣省金融机关之恐慌》，《新闻报》1910 年 11 月 21 日。
- 66 《江西金融恐慌之现相》，《时报》1915 年 10 月 26 日。
- 67 《景镇银根吃紧》，《申报》1914 年 8 月 26 日。
- 68 《景德镇钱业危急之治标策》，《钱业月报》第 4 卷第 9 期, 1924 年 10 月。
- 69 《江浙战争与九江金融之恐慌》，《益世报》1924 年 9 月 20 日。
- 70 《钱业限制申票期限与订定汇划规则》，《银行月刊》第 5 卷第 3 期, 1925 年 3 月。
- 71 《芜湖金融界之现状》，《申报》1926 年 1 月 5 日。
- 72 《最近江西主要产物衰落一瞥》，《申报》1933 年 1 月 23 日。
- 73 程序：《不景气笼罩下之汉口钱业》，《汉口商业月刊》第 2 卷第 9 期, 1935 年 9 月。
- 74 陈志远：《汉口之金融恐慌及其归趋》，《中国经济评论》第 2 卷第 7 期, 1935 年 7 月。
- 75 《申汇暴涨桐油出口受影响》，《四川农业》第 2 卷第 1 期, 1935 年 2 月。
- 76 魏友棐：《宁波的金融风潮》，《钱业月报》第 15 卷第 9 期, 1935 年 9 月。
- 77 张颂华：《余姚金融风潮》，《新闻报》1935 年 10 月 8 日。
- 78 甘祠森：《万县金融风潮之回顾与前瞻》，《银行周报》第 19 卷第 26 期, 1935 年 6 月。
- 79 幼申：《中国最近之金融恐慌及其对策》，《经济评论》第 2 卷第 8 期, 1935 年 8 月。
- 80 《湘省金融恐慌》，《银行周报》第 17 卷第 46 期, 1933 年 11 月。
- 81 刘平编：《稀见民国银行史料四编》（上），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83 页。

82 《重庆金融机关及货币状况》，《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24期, 1930年12月。

83 时广东：《1897—1937 近代中国区域银行发展史研究：以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3—185 页。

84 虞澜康：《从申汇说到现金问题》，《四川经济月刊》第1卷第4期, 1934年4月。

85 周宜甫：《民国二十三年重庆财政金融及进出口贸易之回顾》，《中行月刊》第10卷第3期, 1935年3月。

86 静生：《论芜湖金融与米市》，《工商日报》1934年1月1日。